

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 浦江创新论坛 研究报告

(2011 年第 5 期, 总期第 11 期)

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办公室

2011 年 5 月 31 日

目录

论创新驱动发展 (二)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	2
3.1 改革的阶段: 前 15 年.....	3
3.2 改革的阶段: 后 15 年.....	5
3.3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10
第四章 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机遇和挑战.....	12

编者按: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科技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已经五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又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主题。然而,为什么要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观及发展道路?创新驱动的发展观及发展道路有什么历史渊源?创新驱动的发展观及发展道路有什么特征?这些问题在理论上还有很大探讨空间,在实践上还需要不断探索。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顾淑林为本刊撰稿,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回答,本刊分两期将稿件刊出。本期刊出的是顾淑林文章的第三、四两章。

论创新驱动的发展(二)

撰稿人:顾淑林(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政治领导人的更迭往往是重大政策改变的契机。动因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对中央计划经济的问题的深切感受是为内部原因,周边日本和东亚“小龙”经济战后的快速发展是为来自外部的刺激,也是示范。在1978年的时候,除了高层有所争论,社会大众对改革和开放高度认同。

对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离不开阶段划分。划分阶段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取决于研究问题的着力点。顺着前面讨论的脉络,综合考虑政府的战略和政策的基本走向、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创新系统的转型变化,以及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大体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失真。前半段是通过改革和开放释放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制度的制约积存的潜能的阶段;后半段是加快步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并不非常清楚,大体上应该考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此时国内工业品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几乎同时达到“饱和”,多年遗留的短缺告一段落,寻找新的发展动力,改变发展的路径,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最后选择了大力引进外资和加快进入国际市场。

3.1 改革的阶段：前 15 年

考察改革的起始条件需要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家产。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潜能是巨大的。中央计划经济曾经提供了向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投资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建立了现代重工业和现代国防工业的基础，同时建立了一个门类领域相当齐全的科学体系。计划经济留下的另一种潜能是在消费需求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投资重工业，极大地抑制了轻工业的发展，压低了农产品价格，缩减了居民的消费。这些潜在的能力和需求是改革的起始条件，构成了改革开放前半段的内在动力。

现在，面对 30 年的“市场化”的种种负面结果，有些年轻人对当初改革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改革的初衷。计划经济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第一，如斯蒂格利兹指出的，¹ 它低估了经济合理性和市场的作用；第二，倾向于缩小或关闭对外界的交流。虽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与西方隔绝和后来与前苏联的断交部分是被迫的，是国际政治关系的产物，然而计划经济就其运行的本质而言是倾向对外关闭的。前苏联搞了一个苏东政治和贸易集团，对集团外封闭；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它们的系统对外也相对封闭。² 这两个问题造成了投资效率低下和创新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科尔奈）。作者对比研究过中国和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机械工业。到 1980 年，从企业数量、职工数量和产品质量度量，中国建设了发展中国家最庞大的机械工业，但是这个工业的产出效率，中国不如韩国，甚至不如巴西。³ 孙冶方形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为“复制古董”。

对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略好在哪里呢？第一，他们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努力通过政策手段营造企业间的竞争环境，一定程度上减低了市场信号扭曲的负面作用；第二，通过技术进口和产品出口，打开了比较大的窗口与外部世界保持知识信息的流动，并且获得来自外部市场的较强的激励，因而获得保持系统活力的关

¹ Joseph E. Stiglitz 2001: An Agenda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Draf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iscussion at the UNRISD meeting on *The Need to Rethink Development Economics*, 7-8 September 2001,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t [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document.nsf/d2a23ad2d50cb2a280256eb300385855/11660bb5d7a4bb11c1256bc9004b75fe/\\$FILE/stiglitz.pdf](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document.nsf/d2a23ad2d50cb2a280256eb300385855/11660bb5d7a4bb11c1256bc9004b75fe/$FILE/stiglitz.pdf)

² Chris Freeman 1995: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5-24

³ Shulin Gu 1999: *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Market Reform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第 13 章。

键条件之一——开放性。事实证明，深入理解某些经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曾经把韩国的经验理解为“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显然很片面。同时也显示，开放有度，在维持系统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同时，保护幼稚产业和幼稚能力的成长，也许是追赶政策最困难的部分。

改革开放的前期是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⁴ 增量改革在体制外开辟新的经济活动空间，是不触动原有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允许农村居民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包括牧业、渔业、家禽养殖和短途贩运，乡镇企业的兴起，允许农村和城市个体经营和后来允许私人企业经营，减政放权、价格双轨制和经营承包制度，激发出来的农村和城市居民及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是国内经济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上半叶快速发展的驱动力。在供需缺口很大的情况下，家用电器、轻纺产业等这些过去被抑制的产业显现投资和消费的热潮，压抑很久的需求也旺盛，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在增加，购买力提高。

这个时期的主体经济活动在国内市场上。技术引进继续沿着计划体制下的思路“引进、吸收、消化、改造”安排，由政府主导。事实上吸收、消化和改造工作始终没有真正下功夫。由于行政放权各地方政府争相扩大本地项目上马，一方面快速形成了原来极有限的家电生产能力，同时造成低水平重复引进的浪费。经济特区以加工出口为主，与国内只发生有限的联系，外资主要来自港、澳、台。这一部分经济活动的扩张是东亚已经形成的出口经济的延伸。台湾及所谓的东亚小龙经济，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先后达到就业饱和，随后工资水平急剧上升，转移出去劳动密集加工势在必行。这是中国比之于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地区独特的外部环境。

如果以为增量改革不需要在政策和管理上下功夫，那就错了。当时的开发区就是改革的试验区，做过诸多试验，有的成功并推广，有的失败了。也许这个时期制度调整的最大的动作是废止了已经有 20 年历史的农村公社制度，小农户进入商品生产的大海洋。随之而来的是农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全面改造，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和流通。市场体系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制度建设、管理改革和硬件投资，农副产品市场系统的形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科技体制改革也是这个阶段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注重试验，在试错中摸索下一步方向，是克服经济和社会转型伴随的巨大

⁴ 吴敬琏 200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2003 年。

不确定性所必须的，这是中国比之于其它前苏东国家在转型中比较稳妥、改革和发展得到同步前进的重要原因。

科技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使科学技术系统与转型中的经济和生产系统形成新的匹配关系。⁵ 开拓技术市场实行技术成果的有偿转让，鼓励研究机构与企业签订“横向”合同，鼓励科技人员流动，引进竞争性的科技拨款和成果评议制度，鼓励研究机构办公司来商业化研究成果（火炬计划），鼓励研究所与企业合并，把一部分开发型的工业技术研究所整体转变为营利性企业等，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措施。这样的改革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几乎绝无仅有，到现在对它的成效褒贬不一。

科技体制改革放松了研究机构对科技人员的控制，星期天工程师对乡镇和私营企业的起步和成长起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作用。火炬计划支持了科技人员和一部分研究所进入创业，使得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新的商业机会在市场上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从原来极其弱小的基础上迅速成长，使得中国经济和广大用户由于这个产业的兴起享受计算机“革命”的成果，溢出效应巨大。

不足之处有两类。一类是在当时的设计和操作中，相对忽视了一部分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科技服务，没有加以认真保护。典型的是农业科技服务、卫生科技服务和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另一类是后续的制度调整和管理改进没有及时跟上。典型的是研究所管理体制和科技人员的薪酬制度、激励制度、成果评价制度等，过渡时期的临时措施被凝固了 20 多年，原有的积极意义逐渐演变到了反面。

这个阶段的发展路径的特点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和追加投资，改善了要素——包括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源，存量的配置，从而释放出过去投资沉淀下来的潜能。研发投入的走向也说明了这个结论。自从 1985 年科技体制改革启动，中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从 80 年代中期的 1.2%—1.4% 的水平降到 1995—1997 年连续三年的历史最低点，为 0.6%，这个下降并没有拖累这 10 余年间高速发展的步伐。

3.2 改革的阶段：后 15 年

1992—1993 年的投资热再一次扩张了低水平产能，国内经济加快速度告别“短缺”

⁵ Shulin Gu 1999: *China's Industrial Technology, Market Reforms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第 1 至第 7 章。

时代。到 90 年代中期，供求关系逆转，整体上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至此“增量改革”的空间释放殆尽。投资效益低下和管理不善的痼疾已经不能通过消费和信贷的膨胀来掩盖。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新的动力和方向。

摆在在中国的决策者面前的选择，要么是化大力气重建由于行政分权分割了的国内市场，重塑被各级权力机构设租寻租败坏了的经济信用和商业伦理，恢复公众和投资者信心，给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应竞争的技术学习和管理学习的过渡机会，以激活国内经济活力和内需潜能。这个选择必须进行政治、法律、和分配体制等深层次改革，风险极大，而国内外的诸多压力使得经济增长一刻也不能减慢。受到决策者自身的局限和形势的压迫，1992 年“市场换技术”的口号的出台，事实上已经为选择定下了基调：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更宽松地让外资进来。90 年代后期加紧了参加“世贸”的谈判，同样出于“对前途未卜的国内改革的风险回避和必须维持经济增长的双重政治考虑”：“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实现更大规模的引进外资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国际法的优先地位，将世贸规则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强行转换为中国政府的行为规范，以克服阻力推动国内改革。”⁶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用世贸规则和外部力量来“倒逼”国内改革的选择。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比许多人预想的要快。1993 年外国直接投资为 275 亿美元，比 1992 年猛增了 150%，2000 年为 400 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增速加快，2008 达到 1,080 亿美元，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⁷ 随着政策不断放宽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更有经验，自从加入世贸起，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地转向独资和并购形式。外资并购的金额，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库记载，2003 年为 38 亿美元，2004 年 68 亿美元，2006 年 82 亿美元，2007 年有所收敛，67 亿美元。⁸ 由于在资本市场上的股权收购很难进入这个统计，实际收购金额会高得多。外资并购一度极为张扬，瞄准了一个个基本制造业的排头兵企业，一些案例激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2007 年并购金额的小幅回落，有可能是在强大的社会反响之下政府加紧了监管的结果，时间上与我国反垄断法于 2007 年颁布吻合。

在这个时期，外资独资企业占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数和实际投资额，从 90 年代的

⁶ 岳健勇：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学位论文，来源：<http://www.biyelunwen.cn/papers/14221.html>

⁷ 联合国贸发大会网上数据库：历年外国直接投资，参见 <http://stats.unctad.org/FDI/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⁸ 联合国贸发大会网上数据库：历年外资兼并和收购 <http://stats.unctad.org/FDI/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01>

不足 40%，猛增到 2003 年的 66%和 2007 年的 77%。在一系列行业外资已经占到举足轻重的位置：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为 45.1%，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50.2%，家具制造业 46.9%，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61.2%，塑料制品业 39.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5.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8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62.8%，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38.2%。外资已经全方位进入服务业，包括银行业、物流和 IT 服务业、城市水务、农产品种子和流通环节。在加工制造业，我国全部出口值的 60%、高新技术出口值的 80%由外资企业完成。“加工贸易”，即使用外来的组件和原料加工之后再出口到国外市场的组装出口，在这个时期一直占到全部出口的 50%以上。^{9,10}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 1990 年的 30% 提高到 1995 年的 35%，2000 年的 44%，2002 年的 50%，2003 年的 60%，以后的年份在 60%-70%之间微幅摆动。简言之，这一阶段，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完成了从内向为主向外向为主的转变，达到一种世界上所有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外向”程度。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是推动这个转向的主要力量。招商引资和 GDP 政绩变成官员政绩的指标，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争相提供比中央政策更宽松的条件，通过低廉的土地，优惠的税收减免，和容忍环境的恶化等等，补贴外国投资。管理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刻意漠视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劳动者权利。从而中国成为外资国际流动的首选地。

融入全球经济维持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但这是建立在低工资简单劳动和巨大的环境代价和学习代价基础上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且不提加入世贸不久就频繁暴发的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企业界惊呼，我们卖啥啥贱，买啥啥贵！的确，世界市场就那么大，中国的大规模介入改变了它的均衡，有什么奇怪。

更严重的问题来自在全球分工中中国处于劳动密集的价值低端的角色地位。这种分工造成的低利润很难使企业积累资金投向技术学习，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也极有限。跨国公司掌握着价值链环的整合，控制着知识生产、流动的制高点，还拥有基于所有权（资本）的话语权（决策权）。在越来越普遍采用的模块化技术结构中，技术信息更多地隐藏在重新构造了的简单的模块界面的背后，仅仅靠观察和使用，不容易知其然，更难于破其所以然。事实表明，市场没有换来技术。

⁹ 高粱：外资在华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环球视野》2010 年 3 月 9 日第 282 期。

¹⁰ 中国 B2B 研究中心：本土互联网产业或被外资淘汰，中国经济导报，2009 年 06 月 11 日。

外向型加工不利于技术升级,这是拉丁美洲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吃到的教训。有研究指出,¹¹需要区别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之前特别是20世纪初期的经济“国际化”。在“国际化”时代,全球市场上交易的是最终产品,全部价值活动主要发生在出口国的国界之内。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的价格出售制成品,表示这个经济体已经整合了要素,协调了各环节的价值活动,实现了创新,收获了伴随创新的学习机会,也收获了创新的“租金”回报。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市场上可以交易分隔的价值活动片段。一个出口制成品的国家,如果仅仅为跨国公司完成劳动密集的组装,既得不到什么利润,也学习不到什么技术,他们与过去时期的初级产品出口者处在类似的位置。在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仅仅为跨国公司完成劳动密集的组装,而不同时采取非同寻常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冲向底部”的困境。

有人警告当心我国工业的“无技术化”。¹²“无技术化”的工业化与装备制造业的“退化”有关。创新研究者把一个国家的装备工业看作是整个经济的创新中心。装备工业把先进的技术凝结到各行各业使用的机器设备中,是各行各业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学习机会和创新能力的汇聚点。但是,在“华盛顿共识”的理论构建中,装备制造业是没有地位的,等同于任何其它的制造业。

在外向型出口加工的大潮中,我国的装备制造业也卷入了“大进大出”潮流。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装备生产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再回购符合环境标准要求的机械产品。中国成为承接这一转移的主要对象国。2006年,装备制造业出口额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42%,进口额占全国外贸进口总额的49%。在制品出口中,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长期占50%以上,加工贸易中由三资企业完成的部分占84.2%。¹³因此可以说,除了少数领域少数企业以外,这个国民经济创新中心的装备制造业呈现两个趋势。一是技术和知识活动的低级化,二是在嵌入国际装备制造业的价值和知识系统(的低端)的同时,与本国经济活动的需求脱离互动关系。想想为什么我国关于政府采购的一举一动会那样地触动跨国公司的神经,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采购是联系装备制造业和本国投资的重要纽带,也是在世贸规则之下仅剩不多的支持本地创新的政策手段。

¹¹ Raphael Kaplinsky 2005: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Polity Press, London, UK

¹² 岳健勇: 走出“无技术工业化”的陷阱 《南风窗》特稿: 2009年第1期。

¹³ 高粱: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 书稿, 待出版。

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外部推动国内改革的目的达到了吗？这 10 几年来是中国立法和法制建设最频繁、力度最大的时期。政界、商界、法律界，眼光大大开阔。是一个进步。但是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更多地集中在规范商业和资本活动，商业活动的规范常常偏爱外资。一部保障农民和居民土地及居住权益的拆迁补偿法案，至今还是出不了台。更重要的是，制订法律规章是一回事，是不是和能不能严肃执行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政府治理的公信力没有本质的改进，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

“双顺差”，即外国资本净流入和外贸经常账户净盈余同时存在，已经维持了多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很奇怪的事情。¹⁴ 正常的情况资本应该从资本充足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既然不差钱，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巴望外国公司来投资呢？原因在于国内（对本土投资者）的投资环境不行，还有就是本土投资者的投资能力不行。投资是创新的关键环节，资本必须和技术、管理以及补充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若投资环境和投资能力不改善，虽然存下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还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国投资。下面的事实是国内经营环境改善不大的一个佐证。改革开放的早期浙江的中小企业从本土长出，为本土市场生产。后来，当外单大举进来的时候他们首选了接外单生产，因为数不清的费税和打点以及不透明的治理，大大抬高了做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这些企业于是在改革的后期大量转向外向生产，在经济活动向价值链的低端移动的同时，初步形成的内部价值网络瓦解。

中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增加向科技活动的投资，旨在改善来自内部的技术供给能力。研究与发展活动支出占 GDP 之比从 1999 年的 0.8% 迅速增加到 2009 年的 1.7%，增速居世界各国之首。几乎同时中国的高等学校大规模扩招，中国的科技人员数量也激增。但是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不足。在出口加工制造吸收上亿低技术劳动的同时，上百万大学毕业生求职困难。在论文发表作为评价标准的指挥棒之下，学术界热衷于国外同行在他们需求场景之中的研究热点。所有的大学都想创世界一流，很少认真研究本地区对知识和人才的实际需要。学术界，包括作者身处的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领域，似乎与本国改进管理和政策的要求渐行渐远。

如今，当外向生产走到尽头，我们刻不容缓地需要调整发展战略的时候发现，

¹⁴ 余永定 2010：走向再平衡：终结出口导向型创汇政策，参见余永定博客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82&articleId=19874

当初面对的问题，有的只部分地解决了，有的变得更加严峻。反思这个过程，使我们再次认识，社会改革和技术创新一样，是一个主动学习和试验的“内生”过程。外部力量只是改变的条件，主动的努力才是改变的动因。试图仅仅依靠外部环境的压力来解决内部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外部条件“倒逼”论，当初的世贸规则倒逼，和当今的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倒逼，极容易滋长政策懒汉行为。正确的态度是用好外部机会，在内功上下功夫。

3.3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近几年国际机构的报告频繁拿中国的高速增长做例子，也有把中国的高速增长直接和“华盛顿共识”挂钩的。在“华盛顿共识”主导国际政策舞台的这些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蹶不振，似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是“共识”的成功案例吗？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挂钩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理解科学发展观和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更是不利的。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并不都是国际自由贸易驱动的。我们已经分析了，前半段是内需为主。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是新机会向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开放，整个社会充满乐观气氛，社会收入的差距也不是太大。体制改革聚焦在放松管制、开放贸易和引进外国技术。放松管制和引进国外技术与管理经验能够奏效，在于释放了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能量，在供给能力方面包括工业生产的基础、一定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放松管制还释放了计划经济时代抑制下来的巨大需求。“华盛顿共识”恰恰不关注供给能力的重要性，也不考虑国内民众的参与机会、收入分配对持续经济繁荣的重要性。

第二，改革开放的后期，中国的增长越来越依靠外国投资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基本上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道路。但是中国经济经过了几年的繁荣期，很快面临种种问题。这个方向的不可持续性，如果在 2006 年的时候还有人怀疑，到了 2011 年的今天身处还看不到头的世界经济危机，大概没有人再表示疑义。

上面的分析显示，通过放开国际贸易和大举吸收外国资本走自由贸易驱动的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性，来自一系列问题：经济活动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经济结构扁平化，自主创新和创业被压抑或者忽视；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挤压劳动者报酬；大部分人贫困化和少数人暴富以至社会发生断裂；无视环境保护；创新系统四分五裂和

整个经济的“去技术化”。这些问题之间是互相强化的，以至改变发展的路径非常困难。拉丁美洲和非洲因为“华盛顿共识”遭遇的陷阱也开始在中国显现了。它带有中国的特点，并且，晚出现了一、二十年。

第三个原因，谈发展观有效与否，要看长时期的发展成效，而非几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功地发展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进步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学习型、创新型社会，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不断地从内部发展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组织，有能力通过制度的变化和更新来解决社会的紧张不和谐。所谓的发达国家基本上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它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专门化优势和独特的发展路径，彼此也你起我落、你追我赶，不过由于积累了学习、创造的能力，一时落后一些也还有能力赶上去，经济学家称之为“动态的趋同群”。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史家观察到，¹⁵ ¹⁶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创了所谓“现代增长”时代以来，后进国家追上去，进入到“动态的趋同群”的成功者，除了在地理、文化、政治和人口方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西、北欧和北美，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还只是寥寥无几。时有出现的现象是，一些国家在十年、二十年似乎风光得很，突然之间又跌倒下去，一蹶不振。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菲律宾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巴西，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以前的泰国也是一切看好，之后陷入停滞和社会动荡，是又一个例子。

中国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后十几年，在技术能力、创新系统的构建和效率方面，与第一个时期结束的时候比较，在质上没有大的变化，竞争优势也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加工上。变化最大的却是外资越来越渗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部位。

2004年一位美国人乔舒亚·库珀发表研究中国的文章，提出“北京共识”，定义中国模式为：努力、创新和实验；捍卫国家利益；循序渐进等。认为一度盛行的“华盛顿共识”破坏了十几国的经济，“北京共识”正在取代“华盛顿共识”。提出来以后一度有人欢欣鼓舞。笔者认为“北京共识”起码提得太早。中国发展的路还很长，

¹⁵ Hikino and Amsden: *Staying Behind, Stumbling Back, Sneaking Up, Soaring Ahea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Baumol, W. J., R.R. Nelson and R.N Wolff (eds.)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4: 285-315

¹⁶ Angus Maddison 1994: *Explaining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Nations, 1820-1989*, in Baumol, W. J., R.R. Nelson and R.N Wolff (eds.)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Cross-Nation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4: 20-61

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有待决策者和全国人民的决心、智慧和行动。进一步讲，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冠着中国名头的共识，即便将来哪一天我们很强大很“创新”了。因为我们深信发展的道路有多种可能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不可能照搬。我们不要做“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品，以为自己最有资格去告诉别的国家如何发展和如何管理自己。假如非要一个共识，那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社会公平的、和环境友好的发展，它是世界上争取进步和发展的所有人士和所有国家的共识。

第四章 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机遇和挑战

中外历史经验，对历史经验的理解、解释，无疑是中国决策层做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我们相信，计划经济时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气质和它所呼唤的人民的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引入市场机制的经验，包括市场机制对广泛参与的开放性和高激励，对外开放有利知识、人才的流动作为本国学习的重要来源等等正面的经验，都是“自主创新”新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说“自主创新”将使中国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完全没有道理。同时，这个战略决策吸取了教训。也许最大的教训是：第一，买来外面的技术不等于自己有了技术能力，买得来技术买不来技术能力，市场也换不来技术；第二，自由贸易本身不会自动地引导技术升级和经济结构升级，第三，不加管制的市场和资本会演变成破坏社会的力量，不加管制的外国资本侵蚀本国人民的福利和国家主权。¹⁷ 这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共同吸取的教训。“自主创新”意味着，在开放的环境下中国坚定了发展必须建立在自己努力基点上的战略意识。中国（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在新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明确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民福利的战略立场。这是联合国宪章声明了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力”。

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必须真正转变观念。各行各业都在过去形成了习以为常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常规，其中许多需要改变。只有大家都认识到改变发展路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个改变才有可能，仅仅昭示新的方向和自上而下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自主创新是国策，是国家战略，不是科技政策的放

¹⁷ 最近许多人重读“资本论”。卡尔·波拉尼从更长的历史尺度解释了，一个完全失去社会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历史上，经过一段时间活跃的市场力量提高“效率”之后，总会有“反向运动”来平衡和制约它的反社会性和对环境的破坏性。参阅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大，不仅仅是增加科技投入。经济政策界只有真正认识把创新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的战略重要性，才可能不被动应付。科技界一定要超出自己局部利益，才能主动改善产学研合作关系，在发展的全局中做出贡献。各部门的协调只有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实现，这个协调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极其需要的。

科技政策界和经济政策界交流不够，“语言”不通，有时甚至互相不尊重，会影响形成共识和转变观念。在许多发达国家主流经济政策界对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比较友好，也许部分地源于这些学界之间交流频繁，部分地源于他们原本就是习惯创新的社会。并且，最近从主流中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已经包含了学习和知识的变量。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必须大力提高政策能力。现在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世贸组织的新规则已经禁止了大部分过去追赶国家采用的保护幼稚产业的工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照搬这些经验已经完全行不通。开辟新的有利本土学习和创新的空间需要极大的政策方面的创造性。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改变大项目为主的政府投资方式，改进区域创新政策、行业创新政策的机制、手段和效率，改进国企的治理，改进公共资源的分配机制和公共研发机构的管理，改进创新的环境等，是 OECD 和中国科技部联合对中国创新政策评估以后的建议。¹⁸

我们需要应对的第三个挑战是必须下大力气改进国际社会对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了解，提高参与国际事务的水平和能力。中国太大，长期以来与世界的交流又很少，我们的新战略引起种种好奇和猜测也在所难免。用国际通行的理念和“语言”解释我们的战略，争取国际社会最大多数人士的理解和支持极为重要。事实上，中国的自主创新对和谐、和平的全球秩序将是一个积极因素，大多数不带偏见的国际朋友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一定要下大力气提高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水平。改变我们作为全球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和贸易摩擦的被告角色，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发展中世界和全球关心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道，积极参与全球的制度建设和完善，形成对发展“友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所在。

机会是广阔的。对于自强、自立的国家和民族，“无所作为”不在我们的字典里。更具体地说，勤劳勇敢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凝聚力，辽阔的幅员和纵深，极

¹⁸ OECD 2008: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China, OECD, Paris 2008

其多样化的地方传统和国内需求，已经有相当积累的科学技术基础，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有利发展的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下，一定能把我们的事业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附：全文目录

第一章 发展与科学发展观：一个核心问题

1.1 投资驱动的发展观

1.2 自由贸易驱动的发展观

1.3 创新驱动的发展观

第二章 创新驱动的发展观：历史经验和理论解释

2.1 创新系统概念的形成

2.2 东亚经验

2.3 新的“世界观”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

3.1 改革的阶段：前 15 年

3.2 改革的阶段：后 15 年

3.3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第四章 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机遇和挑战

（如有任何建议，敬请反馈办公室）

主 编：顾淑林

执行编审：张玉臣

责任编辑：邵鲁宁

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办公室：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综合楼 2010 室） 邮编：200092

联系人：邵鲁宁 吴婷

电话：021-65983307、65985664

传真：021- 65984954

邮箱：castm@tongji.edu.cn